

幽公盨辨伪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 杨德乾

幽公盨又名遂公盨、燹公盨，2002年从海外文物市场上购回，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幽公盨的铭文无疑是最吸引人的，因为其铭文所透露出的信息涉及顾颉刚先生早年在古史辨运动中提出的关于禹的一些论断，该青铜器或为这些论断和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更深入的线索。幽公盨自进入公众视野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对其铭文进行了考释，也有许多学者分析了其与大禹治水传说的关系，还探讨了这件器物所体现出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质疑幽公盨真实性的声音仍然存在，并且在形制方面的研究也有欠妥当之处。因此，只有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再采用比较的方法对幽公盨作出研究，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件青铜器。

一、器形的比较

幽公盨高11.8厘米，口径24.8厘米，重2.5千克，器盖已不见。其造型整体为椭方形，四个角为弧形，四个壁比较平直。器物的两端各有一只兽形的半环状鳌；口沿处饰有凤鸟纹，呈对称分布；其腹部有三道突起的瓦棱；其底部为圈足，圈足四面的中间部分有开口（见图1）。

幽公盨在器形上与其他该类型的青铜器存在差异，下面将从器壁形状和盨足两方面与其他青铜器进行比较。

1. 器壁形状的比较

盨与簋在器形上十分相似，在用途上也都是盛食器。早期人们所见到的盨常常是在铭文中已经被命名的，有些没有在铭文中自命名的盨，往往被当作了簋。

将幽公盨与利簋（见图2）、白冬簋（见图3）等相比较，幽公盨的器壁较直，但四个角和两个簋相似，均为弧形。1992年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的晋侯对盨（见图4），器壁则比较圆鼓，接近簋的形状；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所收藏的白敢界盨（见图5），器壁较直，与幽公盨的器壁形状非常相似，然而其四个角却呈现出直角的特征，与幽公盨不同。由此可以认为，幽公盨的器壁形状介乎晋侯对盨和白敢界盨两者之间。



▲图1 幽公盨



▲图2 利簋



▲图3 白冬簋

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的兴盨（见图6），在器壁形状上与豳公盨更加接近，只有两端的器壁略微圆鼓一些。在腹部与底部相接处，二者均呈现出内敛的特征。这一特征与晋侯对盨相符，但是表现程度上略微含蓄一些。白敢界盨在长宽连接处呈现出直角的特征，给人方正刚硬的感觉，与豳公盨、兴盨、晋侯对盨截然不同。

除去足部，豳公盨与其他青铜器的高度相差无几，口部纵长也十分接近。如果当时的铸造工艺水平要根据器形大小来决定腹部与底部的衔接形状，而它们大小相似，那么就不应该出现器壁形状明显不同的情况，可见这与当时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水平无关。再仔细观察：晋侯对盨器壁的弧形程度最大，豳公盨、兴盨次之，到白敢界盨则几乎不存在弧形。然而，它们的年代并非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的，可见偶然性是最主要的因素。

“偶然性”不是所要探讨的结果，而是要从这一现象中发现一个特点。盨，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粱的青铜器，有学者认为“它不是从孟、簋派生，而是从西周中期的附耳方鼎发展而来，在当时是一种新型的盛食器”^[1]。我们可以大胆设想，这种新型的盛食器在周代基本轮廓已定型，但具体的部位并没有严格固定下来。

2. 盨足的比较

豳公盨的足为圈足，与兴盨的圈足略有不同，它在圈足上有开口向下的大括号形状的豁口。其圈足与白敢界盨、晋侯对盨的足相比，差异更大更明显。但这绝不能说明它们中的哪一个不符合盨的特征，更不能认为它们中的哪一个后仿造的，还在仿造中出现了纰漏。

李零先生认为盨的原始形式“应是保持附耳方鼎的样子，器耳为附耳，器足为柱足，器盖上有矩形纽”^[2]，由附耳方鼎发展而来，“但新趋势是易兽耳为兽首鑿，易柱足为圈足或跗足，与鼎告别，向簋靠拢”^[3]。

晋侯对盨为人形柱足，与鼎的足类似，豳公盨为圈足，兴盨也为圈足。然而晋侯对盨是西周晚期的器物，豳公盨、兴盨是西周中期的器物；越晚的反而越接近原始器形，这明显与上文所说的趋势不符。盨这种青铜器确实是从另一种青铜器演化而来的，但我们不应该把它的形态固定化，而应当明确，盨的形态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也可以说盨的形态一直在方鼎与簋的形态之间变化，它的特征可能有时倾向于方鼎，有时倾向于簋。

二、纹饰的比较

豳公盨口沿处有鸟形纹饰，共计十二只鸟，呈对称分布（见图7）。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将鸟纹分为小鸟、长鸟和大鸟三种类型。“大鸟纹是指以鸟纹为主题花纹，并占据了青铜容



▲图4 晋侯对盨



▲图5 白敢界盨



▲图6 兴盨

器的主要部位。”“长尾鸟纹的特征是鸟身比较短小而身后拖着细长而卷曲的尾羽。这种鸟纹大都以带状形式装饰在容器的口沿下、腹上部或圈足上，作为辅助纹饰。”^[4]豳公盨上的鸟纹造型优美，头部前端有尖喙，头顶上有缓带形状的冠，身体小而鸟尾长。综合这些特征，李学勤先生



▲图7 幽公簋口沿纹饰



351



352



353

▲图8 III5式鸟纹



172

▲图9 172号鸟纹

认为这种鸟纹属于《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中所分的III5式鸟纹^[5]（见图8）。

幽公簋上的鸟纹与III5式鸟纹还略有区别。首先，III5式鸟纹的身体比较臃肿，更加写实，而幽公簋鸟纹的身体比III5式鸟纹的身体要纤细很多，并且具有优美的曲折，更加富有美术化特征。其次，III5式鸟纹的身体上明显具有翅膀，尤其是351号、352和353号的翅膀是在身体上用线条来表现的，与351号相比较虽然抽象一些，但还是能明显感受到那就是翅膀。幽公簋鸟纹则没有体现出翅膀。其身体上方的粗线条与头部相连接，没有与身体连接，不能看作其翅膀，而应该当作它的第二重鸟冠。很显然，III5式鸟纹不具有双重鸟冠的特征。按照陈公柔、张长寿二位先生所划定的标准，只有I7式鸟纹具有类似的双重鸟冠，172号鸟纹表现得尤为突出（见图9）。最后，幽公簋鸟纹的尾部下方有云形纹，该云形纹上方还有飘起的长尾，虽然没和身体相连接，但和鸟尾是并列的、紧靠的，如同第二重鸟尾。III5式鸟纹也有云形纹，位置与幽公簋鸟纹也一致，但关键的是没有与云纹相连接的飘起的长尾，明显是鸟纹和云纹的硬性组合，给人的感觉比较呆板，不如幽公簋鸟纹生动活泼，也不如幽公簋上的鸟纹和云纹组合得自然。根据《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中的鸟纹图谱，西周昭王、穆王时期的III4式鸟纹具有此种特征（见图10）。

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上就已经出现了鸟纹，目前发现较早的青铜器上的鸟纹并非都是线条简单的纹饰，有的鸟纹也很复杂，比如鸟纹鼎、虞侯壶等。由此可以看出，鸟纹并非由简单到复杂演变，也不是由复杂到简单演变。幽公簋鸟纹与商代鸟纹相比，更庄重优雅，更具艺术气息，体现了西周中期青铜器纹饰的较高水平，重要的是它兼具多个类型鸟纹的特征，不能被机械地归为《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中

的Ⅲ5式，应当是一种混合类型的新鸟纹。

陈公柔、张长寿二位先生将鸟纹分为25种类型^[6]，张光直先生也分出了35种类型，可见鸟纹样式繁多。“我们祖先对青铜器开始认识的阶段，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7]，到西周时期历时久远，人们对青铜器上的纹饰一定有了非常成熟的认识，工匠们在铸造和设计青铜器的时候一定会参考其他器物，舍去缺点，采纳优点，最终会呈现出别具特色的器物纹饰。

三、字体、字形的比较

早在1993年，从文俊先生就提到过西周中后期的金文“线条式样单纯，线条的完成仅在于收束和平衡呈游离状态的每一个字形组合成分，从偏旁到一字，再到全篇，形成一种颇为特殊的秩序感”^[8]。现在再来看幽公盨，每个字的线条质朴单纯，颇有秩序；前九行均为十个字，排列有序；最后一行虽为八个字，却是均匀排列的，利用放大字与字之间的空间，在整体上与前九行保持一致，仍然能体现出从文俊先生所归纳出的特征（见图11、图12）。

从文俊先生还提到过“（西周中期）还有一种比较简便实用的简化‘篆引’形式，很少注意字形大小的均匀整齐和线条的屈曲圆转”^[9]。从幽公盨的书写方法来看，其起笔处与收笔处有回环的处理，使得笔道两端均无锋芒，加之笔道整体用力均匀，字体呈现出高古质朴的特征，但又与后代小篆那种屈曲圆转的笔道不完全相同，这种字体已经体现出了篆引的特点。很明显，它具有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书法特征。

杜廼松先生曾说：“虢季子白盘，结体圆润灵秀，亮丽优美，昭示出小篆韵味，开辟了大篆向小篆发展演变的先导。”^[10]幽公盨的书法线条呈现出了曲折的状态，虽然不同于虢季子白盘，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具有了小篆的韵味。

幽公盨的金文字体与史墙盘、五祀卫鼎的字体十分相似（见图13、图14），几乎没有任何修饰，只是单纯的线条在有秩序地组合。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十五年趙曹鼎从字体风格和时间上来看，确实为西周恭王时期的器物，其笔道的形态与幽公盨如出一辙。“商代晚期和西周前期金文的字形，象形程度仍然比较高，弯弯曲曲的线条很多，笔道有粗有细，并且还包含不少根本不能算作笔道的呈方、圆等形的团块，书写起来很费事。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使文字线条化、平直化。”^[11]幽公盨与史墙



341



342



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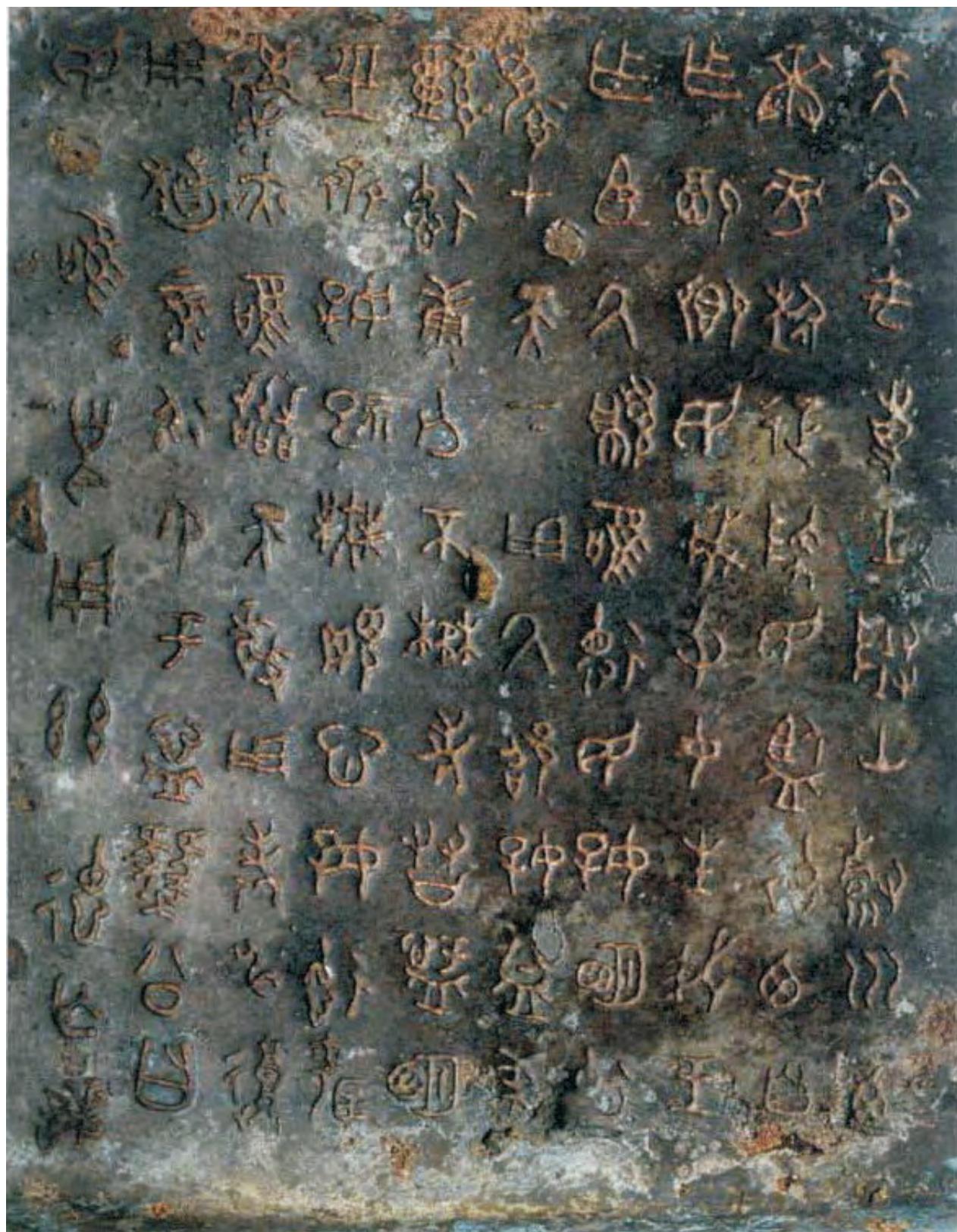


344

▲图10 Ⅲ4式鸟纹



▲图11 幽公盨内底铭文



▲图12 幽公盨内底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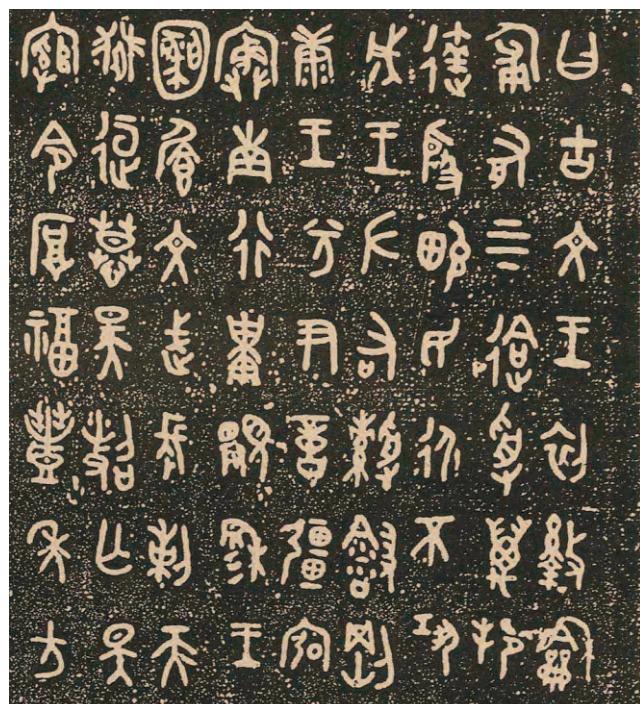
盘、五祀卫鼎等青铜器的字体已经出现了线条化和平直化的趋势。这种“线条化”与“平直化”是将商代、西周前期金文的较高的象形部分（如实心的团块）变成线条，然而这种“线条化”“平直化”又不是隶变过程中“解散篆体、改曲为直”^[12]的过程。幽公盨的这种字体是古文字发展演变历程中的一个表现，是高度象形向篆文演变的过程中其特征的集中体现。

幽公盨与召鼎铭文的字体更加接近。现举一字来作为说明，幽公盨上的“迺”字作
，召鼎上的“迺”字作
，两者无论是在字形的构造上还是在笔道的处理上，都十分相似。前者虽然因为器壁锈蚀在最下边的笔画有些残缺，但仍然可以从残存的痕迹上看出其笔道的方向是呈弧形的，收笔处应微微上扬，与召鼎的最后一笔极为相似。幽公盨上的
字，与史墙盘上的
字也属于这种情况，字形构造与笔道十分相似。可见幽公盨在年代上与召鼎、史墙盘应相差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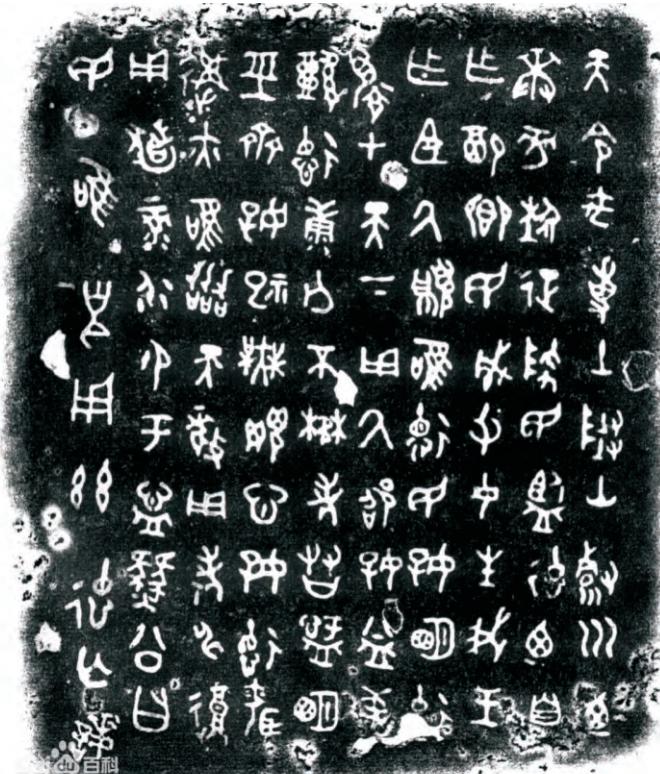
曾有人在字形上质疑幽公盨，认为幽公盨铭文中同一个字竟然有不同的写法。幽公盨铭文中的“隹”字，出现了三次分别作
、
、
，这三个字形的右半部分确实存在差异，但是没有脱离“隹”字的基本写法。《说文解字》：“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13]幽公盨上的这三个字形，仍具有象形的特征，很清晰地表现出了鸟头和羽翼的特征。小篆之前的古文字，常常出现一字多形的情况，《金文编》《古文字类编》等常常在一个字头之下罗列许多字形，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字多形”与裘锡圭先生所说的“一词多形”^[14]迥然不同。

这种情况在其他青铜器的铭文中也曾出现过。召鼎铭文中“隹”字共出现两次，还出现一次“唯”字。而有一个“隹”字写作
，上半部分第二笔出头，且向上扬起。另外一个“隹”字写作
，“唯”字则写作
，两个“隹”字上半部分均没有出头，与前者截然不同。

如果认为幽公盨的“唯”字是潦草导致的，潦草也算作质疑幽公盨的原因的话，那么格伯簋铭文中的
字，则更加潦草。“西周春秋时代一般金文的字体，大概可以代表当时的正体。一部分写得



▲图13 史墙盘铭文拓片局部



▲图14 幽公盨内底铭文拓片

比较草率的金文，则反映了俗体的一些情况。”^[15]

四、铭文考释的比较

自幽公盨发现之后，许多人都对其铭文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命名上尚存在诸多分歧。幽公盨铭文与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相比较，在格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大多数青铜器在开头处常常有年月、月相的说辞，在结尾处常常有“子子孙孙永宝用”或“万世永保用”这样的套话，而幽公盨全没有。李零先生认为幽公盨铭文的内容不是陈梦家先生所说的“祭祀类”

“战功类”“册赏类”“诉讼类”等。^[16]从内容上看，它与《尚书》颇为相似，更像是一篇散文。幽公盨处处流露出独特，这正是它的特色。如果后人想造假，应该极力模仿其他青铜器才是，不会冒此大风险作一件差异很大的器物。

裘锡圭、李学勤、朱凤瀚、李零、冯时几位先生都曾考释过幽公盨的铭文，本文不一一列举，只对个别字的不同隶定进行比较一下（见表1）。几位学者考释之后，有的在字形上有差异，有的字形相似，但在字义的阐释上有差异。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于第四个字，笔者有些想法。在隶定古文字的时候，有些情况下是可以隶定出多个字形的，这若干个字形甚至都是正确的。裘锡圭先生曾在《文字学概要》中提到过文字的分化，或许幽公盨上的这个字正好与此暗合。该字在后来的演变中，为了分散文字的

职务，分化出若干新字形，这些新字形分散在当今的文字中，所以在隶定的时候，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五、结语

在撰写本文之前，笔者从网络上发现了一些对幽公盨质疑的声音，遂完成此文。通过对器壁、盨足、纹饰和字体、字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1.幽公盨在器形上总体符合西周中期盨的特点，但不完全相同，这正是西周时期盨这种青铜器在器形上处于动态变化的表现；2.幽公盨的鸟纹不能简单地归为Ⅲ5式，而更像一种混合类型的新鸟纹；3.幽公盨的字体、字形完全符合西周中期的金文特点，并出现了俗体，我们不能认为出现这种俗体就是伪器；4.文字的分化是一种客观现实，因此在隶定古文字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通过对幽公盨的研究，我们可以断定，幽公盨确实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而且还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现象。

幽公盨的铭文记载了禹“敷土、随山、濬川”的事迹。从幽公盨的这些信息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禹在西周中期人们心中的位置，所以幽公盨确实是一件珍贵而颇具说服力的器物。裘先生认为幽公盨“不能成为支持顾氏‘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说法的证据”。^[17]谢维扬先生也认为“它对讨论‘层累说’问题的意义就是打破了顾先生早年提出的禹是中国传说时

表1 专家对幽公盨铭文的不同见解

	李学勤	裘锡圭	李零	朱凤瀚	冯时
	随	墮	随	陶	墮
	差（择）	畴（类）	拜	奏	任
	邵（绍）	邵	邵（诏）	邵（昭）	邵（继）
	覩	魄（悖）	颯（期）	覩（欺）	魄（愧）
	卽	孚	危	御	卽

代故事最早元素的假说”^[18]。客观来看，幽公盨真的可以推翻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吗？这就牵扯到文献是否有因承性这一问题。如果承认文献具有因承性，那么根据幽公盨的记载，就可以看出：禹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是古老传说了，那么禹生活的时代一定远早于西周中期，并且禹确实存在，甚至在亡佚的文献中应该还有关于他的记载。如果不承认幽公盨具有文献上的因承性，那么就无法推论出上述结论，只能够证明顾颉刚先生把禹出现的时间定晚了。所以在探讨“层累说”的时候，不能绕开文献是否具有因承性这一问题。

虽然，幽公盨与众多青铜器相比较，只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器物，但对于揭开早期中国文明面纱来说，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 [1][2][3]李零.论幽公盨发现的意义[J].中国历史文物，2002，(6) .
- [4]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J].考古学报，1984，(3) : 273-276.
- [5]李学勤.论幽公盨及其重要意义[J].中国历史文物，2002，(6) : 5-12.
- [6]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J].考古学报，1984，(3) : 268-270.
- [7]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
- [8]丛文俊.商周金文书法综论[A].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商周金文卷[C].北京：荣宝斋，1993.11.
- [9]丛文俊.商周金文书法综论[A].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商周金文卷[C].北京：荣宝斋，1993.4.
- [10]杜迺松.杜迺松说青铜器与铭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58.
- [1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46.
- [1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2.
- [1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76.
- [14]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58.
- [1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48.
- [16]李零.论幽公盨发现的意义[J].中国历史文物，2002，(6) : 35-45.
- [17]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A].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2.
- [18]谢维扬.“层累说”与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的建立[J].社会科学，2010，(11) : 140-148.

卓克艺术网

中国大型艺术类商业门户网站

www.zhuokearts.com

客服部: 0551-65181275 拍卖部: 0551-65378517 65987553 艺术部: 0551-65378513 65378515
E-MAIL: zhkarts@vip.163.com 邮编: 230031 传真: 0551-65378502
地 址: 合肥市蜀山区青阳北路虹雨花园2幢101